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1年1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 **6**、浏览最新信息可登陆豆瓣"独立阅读"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执行编辑: 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扬克、灵子

轮值编辑: 扬克

观察员: 文学: 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艺术: 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葭 (北京)、罗四鸰(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吴强(北京)

翻译: 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年前捧着 iPad 读完一遍《红楼梦》,唏嘘之余想起毛太公的评论:大观园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但这阶级斗争看来看去也就是勾结贼人劫走妙玉的土匪勾当,若从政治角度评论,我想说的倒是:荣衰更替、转瞬即逝,归根结底是中国没有私有产权的清晰界定与法律保障。时至今日,依旧如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红楼中有判词曰"虎兔相逢大梦归",旧历新年将至,又是一回虎兔相逢,不惟个人身世如此,国运也世事难料。拜年的同时,也请各位看官拭目以待。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 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 史: 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 吾欲中产, 斯中产至矣

书评

扬 克:一部关于恶的百科全书 王晓渔:民国教科书与党化教育

艺术

言 一: 本雅明的废墟与柯林罗的拼贴

刘 柠: 为什么我喜爱宋庄甚于 798?

逝者•史铁生

夏佑至:被流星砸中之后

访谈

灵 子: 乡村的问题该解决了——梁鸿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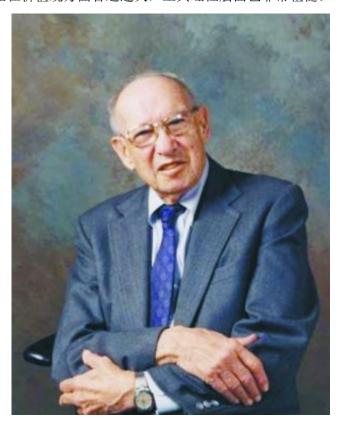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最近参加各种好书的颁奖典礼,基本的印象,是好书都来自国外,本土书,大多数都是垃圾。以所谓财经图书为例,这一年继续高居排行榜榜首,依然是郎咸平的帝国主义言辞,宋鸿兵的假想货币战争。居于第二阵营的,则是那些财富八卦故事,铺满了中国人渴望发财的种种成功学技巧。我向来并不反感商业写作,毕竟商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市场现象,自有它的内在逻辑。某种意义上,商业的演进其实隐含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谱系。我对财经写作的基本面,大致沿着价值观的传导、工具理性的呈现、一定码洋的畅销这三个维度来观察。今日中国之财经写作,明显在价值观方面普遍迷失,工具理性层面也非常粗糙。

我想起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 突飞猛进,他们的商业写作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众所 周知的《公司的概念》(罗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慕凤丽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3月),本是一本量身定做的公司史,通用花了大 价钱请来德鲁克当写手,不料德鲁克却由此发现了人 类社会的一个动向,人类组织的逻辑,正在由国家过 渡到公司,公司成为一种人文组织,正在消解国家和 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缘、意识形态边缘、人的身份边缘 和利益边缘,现代公司正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毫无 疑问, 德鲁克的这种分析, 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 事实,而开放、融合、互动、利益共享正在成为我们 的方法论, 那些老旧的对抗、杀伐、敌意成为这个世 界上少数反对开放、反对市场的旧式价值观。很不幸, 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然活在这种旧式的价 值观里,自己把自己弄得热血沸腾。郎咸平、宋鸿兵 之流, 刚好就是利用了民众这种不开放的心态, 用几 本毫无视野的书,赚取大众的无知钱。



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商业趣味。改革开放已经 **30** 多年,我们依然只是一群仅仅渴望财富的单细胞生物,关于开放,关于自由,关于每个人的独立生活,我们的财经写作,几近于无。我们没有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 年 **12** 月;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 年 **6** 月)这样放眼未来、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先知般的预言,也没有钱德勒《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年 **1** 月)这样反复阐述新技术推动自由、自由推动新技术,既有清晰的价值谱系、又有严谨工具理性的博学著作。我们只有一些廉价的、守旧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以反市场、反开放、反贸易为荣。

如果说本土的财经图书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用不太专业的八卦手段,用粗糙、煽情的中文,给众 人讲述了一些非常不靠谱的发财故事。也许这才是时代的主题,所有人都想着今天发财,想着今天成功,



至于明天怎样,没有人在意,反正每个人迟早都会死去。 我想这正是太多的人怀念 **80** 年代的原因之一,今天真的很难找到一本让所有人激动复激动的书,可是 **80** 年代有《走向未来》。

在成堆的财经书垃圾之中,我个人认为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大致是一本有价值谱系,文献谨慎的著作。也许是眼下这个时代正在倒退的缘故,最近2年,上个世纪的80年代,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断怀念的主题。先是生活的审美,接着是文化,是思想,现在轮到经济学出场了。读书人柳红有新著在此,通篇读来,众人倾慕的80年代,俨然成为一个经济学勃兴、且成就斐然的年代。

这当然是柳红一个人的 80 年代,或者说一群中国经济 学人的 80 年代。在这样的意义上,柳红的写作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从实际的经济变迁来看,80 年代当然是一个市场经济起步的年代,意识形态方面,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开始普遍地为生活、为生意、为自己的财

富而工作。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定义,人们基于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工作,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柳红说 **80** 年代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与历史大致相符。

但是有两个层面的现象无法回避。第一,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学人大体沿着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层面工作,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按照罗斯巴德和布坎南的理解,经济学人必须是独立的思想个体,这是最基本的前提。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的常态下并没有太多为政府当幕僚的责任,只有政府开始干扰市场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显现出来,经济学家最大的工作,只能是纯粹经济学理论的探讨。柳红记录下的 1984 年 9 月的莫干山会议,如今已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学史上最优美的风景,但这个会议当初的宗旨,却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

第二,如果撇开时代的荒诞,单单就经济学的水平来看,80年代的经济学成就只有2条,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由中国农民自发形成的土地制度改革,事实上预示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路径,即在产权意义上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私有化性质的确定。杜润生有言,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农民的经济学成果,与中国的经济学界关系不大,其次,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向,它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二是双轨制。这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在80年代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理论突破。它的意义在于撕开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用一种半拉子的价格改革,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推上路。

如此,所谓 **80** 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当时当地,更多表现为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勇气,而不是水准。而在实际的生活层面,这种勇气显然不能成为 **80** 年代人们的光荣与梦想,经济学与普罗大众似乎关系不大。或者我们直接说,对于一个个具体的面孔而言,**80** 年代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年代,**80** 年代应该是一个美学的年代,艺术的年代,思想被激活的年代。

图1为德鲁克。

LITERATURE・FICTION 写作・虚构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的就是平庸之人,庸庸碌碌,又难自知。但他们也要呼吸,歌唱,开心,或沮丧,为一个不大的小事受到鼓舞,为一个乏味的美好而欢呼。于是,你能听到太多的欢呼声,它们来源于办公室、家里、KTV、马路上……非常轻浮,比鹅毛还轻一点,但足够平庸人消遣娱乐了,过不了多久,他们或许已经遗忘,或者刻骨铭心,不过都无所谓,那些轻薄的笑声和呼喊都是尘埃,腾空而起的瞬间和徐徐降落的日子里,平庸的人儿啊,自己把自己搞激动了,借用一点外力,好像世界就此便在他的眼皮底下改变了。成年人活成这样,充满童话色彩,你听过吗?平庸的力量,不是《庸见词典》(福楼拜 著,施康强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9 月)那些,而是真的不值一提的生活本身贡献出来的笑声。



我在翻两本书时想到上面这些,可是我呢,其实一点贬义 没有,不管你信不信。看别人的书,我想的不仅仅是别人。平 庸永远属于大多数,只是大多时候我们不自知,或者不愿意信 以为真罢了。《九万字》(叶三 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年3月), 够威武、磅礴, 大气得像个领袖, 至少也是个革命 家,显然不是平庸者,但一本书足以留下个平庸印象给这个世 界。作者在自序中说到:"每个对文字怀着野心的人大概都有 中诺贝尔的梦。于我,八分为奖金,两分为致辞。"这是一份 足以让人滴下眼泪的告白,卑微地存在于世。虽然它们印成铅 字被装订成一个个成品会在若干时间里存在于书店、图书馆, 但几乎没有意外,它们会跟我们的肉体一样灰飞烟灭。这样说, 不是说这本书不值得一看, 而是太多的烟雨都只能留着感慨, 一无是处做不到,但化身超人也只能是童年梦魇。《九万字》 属于那种一眼看去就才华横溢的作品,自成一体的叙事,万事 万物在作者那里都只是道具,它的好玩和与众不同的说法才是 看点。好久没看过这种文艺青年作品综合集了。

《多情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

青年作家瓦当的短篇小说集,标题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装逼犯"的变异,至少它有了一种从容的冒犯感,多情亦是无聊。不能把平庸化作动力去改造世界,平庸留下的只能是灰烬,或者干脆白茫茫的一片。但,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不甘心啊,或心怀侥幸,万一,万一,万一呢,据我多年观察考证,每个人要成为自己眼里的自己成功率不会超过万分之一。从青年一直到中年,我们怀揣美好梦想活到今天,但事实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不是蠢蛋,但也绝不是天才。但我喜欢只有天才才能从事的玩意儿啊,你说咋办呢?世上大多乏味而笑声朗朗的幽默,便诞生于此。为此,悲哀,却不是骂声;感动,而不是自慰,只能如此。《多情犯》展示的是平庸时代里的平庸作为,再乏味也是生活,枯燥和丰富永远是勾结在一起的患难夫妻。你见过惊心动魄的悬念或者气壮山河的史诗,那也一定有理由见见这种平乏而百无聊赖的个人生活。作家瓦当有着一种对慢条斯理叙事的着迷神情,在他那生活似乎不存在激烈,只有恍惚和犹豫后的必然呈现。

刚才说一万人里才有一个人成为自己眼中的成功人士,其实也不尽然。有时候猛然一望,就能发现几个脸皮够厚的人在那手舞足蹈,如果他们不是自己眼中的成功人士,那便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那么得意洋

洋。《烂生活》(凤凰出版社,**2010** 年 **11** 月)有个副题,叫"一部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绚烂生活展",这倒给了人们怀念、纪念以借口,我们是看生活展,即工作之外的八卦,这便不需什么曾经伟大了。作者黄燎原是北京资深摇滚老炮,虽然没有唱过歌、弹过琴,但是中国摇滚不可忽略的见证人和经历者之一,风云也好,风花雪月也罢,一种堕落得几乎找不到借口的生活,这本书都给以展示了。自从"怒放英雄"这个名字被端出来以后,中国摇滚似乎到了可以被纪念的阶段。可是你知道,要么是曾直指人心,要么是曾经辉煌抵达过巅峰,人们才可以在此后的岁月里掏出一段旧日情怀来抚摸一遍。我们的中国摇滚,怎么说她呢,反正用一种纪念伟大的声调去怀念她,挺让人恶心的。

为平庸者歌唱,有两种态度,一是自然而然,如河水流淌,不刻意寄托理想、情操之类的玩意,舒服歌唱;一种是道貌岸然,心怀叵测,至少希望自己的歌声被听到,甚至引起共鸣。后者自然是不得要领的功利代名词。前者才是真正的歌者。

日本作家青山七惠从《一个人的好天气》(竺家荣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9月)开始,从她笔下人们就能听到 了一种真诚的凡人之歌。作为一名天才型女作家,青山七惠有 足够的耐心,来写她脑子里那些辗转反侧犹豫徘徊的青春往 事,仿佛一步一个脚印,大大方方也妥帖合适地成了日本备受 瞩目的年轻作家。如今青山七惠在日本堪称成功,她去法国学 习、瑞士旅行、继续写作,过散漫的生活,这成了她笔下主人 公理所应当羡慕的生活方式。《魔法师俱乐部》(竺家荣译,金 城出版社,2010年10月),青山七惠这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一 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姑娘身上,透过她稚嫩古怪的视角,再次 抵达一代人的成长隐秘。如果说青山七惠擅长描写小事物、小 感受, 那么这种集中细微描写的本事并非孤立, 在日本的文艺 作品中常可以找到传承痕迹。主人公"结仁"在学校备受排斥, 孤独地成长, 她是同学眼中的怪人, 即便在家人看来也似乎可 有可无,她与仅有的两个小朋友组成了魔法俱乐部,用以排遣 寂寞,更是用来与这个奇怪斑斓的成人世界对抗、沟通、融合。





《人间失格》(高詹灿、袁斌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11月)是日本"无赖派"文学大师太宰治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就此为其自杀带来一丝迷离气息,人们或许会通过它,来解读死亡。挥霍、堕落、迷惘,但这一切所消耗的却是无伤害性的自身生命。初读太宰治甚至会感受一种学究劲,不是迷茫,也无堕落,那种累了只想歇会的心境展露无疑。文学不是来教你如何生活,它甚至不能帮助你更好活下去,辨析真相,估计也难做到,太宰治那一代的作家情真意切地剖析自己给人们看,这一点足以流传千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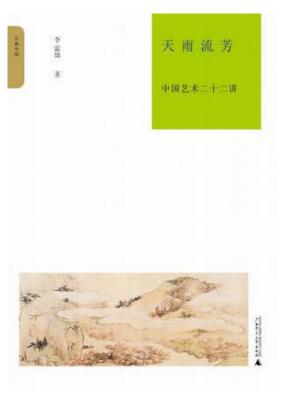
我那么崇拜日本文学,不再推荐一本还真不甘心。尽管我读的不多,可还是发现了点"常识"在里面。一般来讲,中国作家喜欢颠覆、背叛,就是说敲前人的脑壳,诋毁自己之前所有的东西,称之为糟粕,恨不得一睁眼就将之干死。日本人就不然,他们身上都有很好的传承,前人的东西是用来继承和发扬,而非简单颠覆。颠来覆去,其实我们真有本事推翻那么多吗?《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中村文则著,姜楠译,金城出版社,2010 年 10 月)是本"小书",凡人生死是主题。叩问生死,一旦写入小说,就难免被看成凌空蹈虚的生命史诗主题,但这部来自于日本青年作家的作品显然不是,至少它关注的是青春期那些脆弱凡人的生命。青春题材,常被看成自怜自爱,惆怅、忧郁,难免成为这个成长阶段的主题,这看似老

生常谈,但在年轻作者笔下也常有新鲜细节击中你我。作为少数派和边缘人群,也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中村文则非常年轻,作为小说家来说三十出头是不错年纪,他以"恶"趣味被人知晓,"恶"出快感,也是一种才华。至少中村文则告诉我们一件事,个性或才华不一定非要在打到前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

LITERATURE・NONFICTION 写作・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2010 年我以为有一册书,读来甚好,却没有得到广泛 注意,那就是李灿霖的《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此书作者原为台湾故 宫博物院副院长,这册书原为作者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 学等高校所作的艺术史讲稿,后来在台湾的《雄狮美术》杂 志进行连载,继而结集出版,名为《艺术欣赏与人生》。李 霖灿青年时代研究云南纳西文化,晚年则致力于研究中国美 术史,均有成就,他的儿子李在中于此书序言中,写到其父 生前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总结,很是诗意,但也足以傲人,"一 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读画,足堪告慰 的是,入两座宝山都没有空手而归。"对我这样从未接受过 系统美术教育的读者来说,李霖灿的著作真是非常合适的入 门读物,其一是作者对中西美术史了然于胸,特别是对中国 传统艺术杰作如数家珍,他书中所举例子以及使用的插图, 也大都采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图片, 真是近水楼台了, 而我也由此打开眼界,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璀璨精华,有了 一次真正的认知,也因此,读他的著作,会感到亲切、新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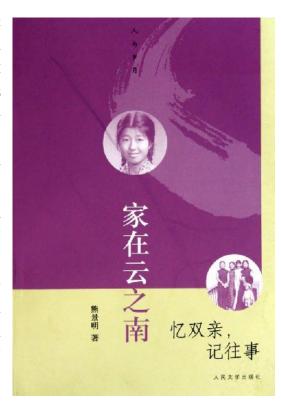
惊叹,甚至一种如鱼饮水的滋味;另一方面,则是李霖灿的文笔与章法,让我佩服之极,文字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颇有如坐春风之感;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介绍与阐述,往往提取和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特征,又常与西方艺术进行比较论析,让人感到总能切中要害,读之有天雨流芳的奇妙之感。李霖灿的著作还有《中国美术史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一册,同样不容错过。

近来集中精力,还先后读了由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的《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以及缪钺的《诗词散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都觉得颇有启发。这两册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著作都非体系严密的学术论著,而是带有随感乃至体悟性质的文章或片段。老一辈学人作文章,从来不受什么约束,但细细读来,不难发现这些文章都是对研究对象多年的体悟与把玩。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文化涂炭的时代末尾,又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往往所知甚少,幸亏还有这样优秀的入门读物,可以让我们更深地看到那些中国文化内部的微妙与优雅,也可见我们对于文化的吸纳,也是绝对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彻底丢弃。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册书均与现在声名颇大的叶嘉莹有关,《顾随诗词讲记》乃是她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聆听的课堂讲稿,后随身携带,从大陆到台湾再到加拿大,辗转流离,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得以整理出版,叶嘉莹如此形容顾随对于她的影响:"自从上过先生

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而缪钺的《诗词散论》对于叶嘉莹的影响,她以为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关键,"《人间词话》是我 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途径中,为我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而《诗词散论》则是在我已经逐渐养成了一己 评赏之能力以后使我能获得更多之灵感与共鸣的一种光照。"由此可见,人生有所成就,良师与佳作都是一 种恩赐。

2010 年是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根据杨绛的提议,由他生前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选了一册《钱 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丁伟志主编,三联书店,2010 年 11 月),以作纪念。我本不打算读这样具有名人追忆与歌颂嫌疑的纪念文集,但因为其中有我老师的一篇文章,也便逐一读了,没想到读后却是惊讶和感慨,为这个难得一出的学术大师,也为这个令人哀叹的民族。这册纪念文集收录了钱锺书生前在社会科学院的不少同事与朋友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许多钱锺书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片段,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钱锺书,十分有价值,这也是我觉得此书颇可一读的地方。这里仅列几个读到的片段。钱锺书被关在"牛棚"中时打扫厕所,有个同事到厕所,每每见到钱锺书不是用拖把拖地,就是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来苏儿",在洗刷便池;一见到有人来上厕所,他就点点头,轻声说:"已经洗干净了,进去吧。"然后又轻轻退出。那位追忆往事的同事见到钱锺书时,"两鬓苍苍十指黑",时值冬日,天气寒冷,手指已经开裂,还贴着不少胶布,让人看着心疼。后来钱锺书还曾被安排到"五七干校"的工地去做体力劳动,因为年迈病弱,十分吃力,有个女同事刚探亲回来,带了几个胡萝卜,悄悄递给了钱锺书一个,中午休息的时刻,这个女同事看到钱锺书面对着墙,在吃那个胡萝卜。

2010年在大陆出版的非虚构纪实作品中,齐邦媛的回忆录 《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袁敏的回忆录《重返 1976》(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和熊景明回忆录《家 在云之南: 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 月)都很值得一读。之所以如此评说,因为在时代的灾难与个 人的苦难背后,难得的是作者还有一种诗意与清醒的个人气 质。《巨流河》已多有议论、《重返1976》也很受关注,这或许 与传主较为特殊的身份有关,而我以为值得关注的还有身份相 对平凡和陌生的熊景明,她的这册回忆录夹杂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一套"人与岁月"丛书中,我差点错过。这本书有一个细 节印象非常深刻,1971年春节临近的一天,熊景明正在昆明郊 县为军民联欢晚会担任司仪并演出,当时正好化完妆,准备登 台,同事捎来男友的一封信,熊景明匆匆看完,上台微笑着报 幕,下台便泪流满面。记得泪水把满脸的脂粉弄得很乱,再上 台便得不停地补妆。熊景明那时刚刚从云南大学外文系毕业不 久,经过军垦农场的劳动教育和改造,被分配在昆明的澄县中 学任教,爱情来得浪漫又匆忙,但因为家庭出身的政治原因,



不得不选择与男友分手,她说自己那时或许因为熟读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爱情故事,很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这些文学大师的影响,觉得爱情最重要的,莫过于和真心相爱的人携手相伴,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后来在写给男友但未曾寄出的信中,她说自己希望能够将来出国去写作,将这个时代的真相记录下来。

或许因为对于自身境遇的悲愤和不满,也或许因为对于那个荒诞岁月的历史真相有过清醒的认识和思

考,她曾这样感慨自己当时的心境:"相信谎言是无知和愚蠢,明白真相而没有说真话的权利却那么折磨人。"那还是"文革"正如火如荼的年代,出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异想天开的事情,而试图记录时代的真相,也是痴人说梦,甚至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可谁也没想到,八年后,熊景明真的离开了大陆,1979年,她移居香港并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权利,2010年的春天,她写完了关于自己人生前半段经历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完成了近四十年前的那个夙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娓娓道来。1988年,熊景明开始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其间多次回到故乡对贫困地区开展国际援助计划,并撰写了很多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直到2007年退休,历时近二十年。退休后,她又担任中心的"民间历史"(www.mjlsh.net)收藏及其网站的相关工作。这个网站我常常登陆,这里也推荐给大家。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在前几期,笔者曾推荐过一本大陆版的《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提到该译本的种种过失与缺陷,并且为其台湾译本《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年11月)未能在大陆刊行而感到遗憾,就马上有热心读者留言纠谬,提到那个台湾译本的译者并非是丁乃竺女士,而是赖声川,这里要对这位读者表示感激。



在推荐前一本书后,我也试图搜寻该书对话者之一的马修(Matthieu Ricard)的另外一部对话录:《僧侣与科学家:宇宙与人生的对谈》(杜默译,台北:先觉出版社,2003年2月),该书是马修与一位华人科学家郑春淳关于科学及佛法的对话,主题自然是我深感兴趣的,该书虽是台湾版,但网络上已有热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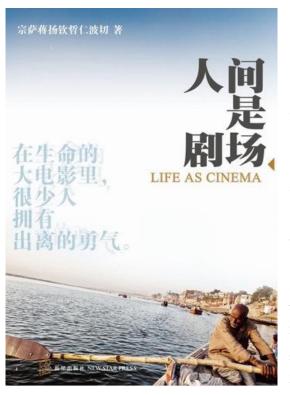
扫描,因此各位可以上网搜索获得。

虽然空闲时间廖廖,我仍然抽空快速读完了该书前五章,相比《僧侣与哲学家》而言,此书内容显然 相对难读,也需要基础的科学背景才能完全跟上他们对话的精要部分。正如两位对话者交待的,该书并非 是想用佛法印证科学,或者用科学来支持或反对佛法,而是想在佛法与科学之间搭上一座沟通的桥梁。尽 管两位对话者诚意可嘉,仍然可以强烈感觉到科学家与僧侣之间一些基本预设上的根本差异,马修本人其 实就是生物学出身,当年的导师贾克勃(Fracois Jacob)还曾获得过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应算系出名门, 同样有着深厚的科学背景,但阅读下来,常感到双方的对话会难以为续,如履薄冰,甚至有时还有"鸡同 鸭讲"之叹。但幸运的是,双方的坦诚挽救了一次次"针锋相对"且行将陷入僵局的思想对话。

关于佛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是泾渭分明,互不关涉,稍有跨界者,马上会引发异议,如国 内著名科学家朱清时近来一篇《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就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佛教徒当然会因各种 原因而对科学家对佛法的肯定感到欣慰,但方舟子却在论坛上批评朱清时"援宗教入科学",是地道的"伪 科学"。我非科学人士,自然无力置喙此事的是与非,但相比马修与郑春淳之间对话的真诚,我们是否缺少 一点什么?

回到问题本身, 佛法可以和科学沟通吗? 或者说, 为何他们之间需要对话? 马修的一段话无疑值得摘 录在此,供大家思考:

在我看来,自然科学和佛学对照最饶富兴味的是在分析究竟实相部分,这次对话令我获益良多,也让 我不得不面对这两门学问相关的新问题——特别是在意识本质,以及现代物理学与佛法根本的现象相依性 上。意识本质仍然是个令人著迷的课题:它可以简约为大脑吗?是生起于物质的现象?还是如佛教所说的,



纯粹生于前念意识相续不绝,没有物理架构?

诚然, 佛法是关于世间实相的探索, 但是这种思想探索 既可以《阿含经》中的朴素话语加以演绎,也可以《阿弥陀 经》中的极乐净土场景来唤醒虔诚之心,同样的,在现代世 界中,以何种语言、何种方式来表达佛法要义,既是弘法者 的善巧方便, 也是时代的需要所在, 而就这一点来讲, 宗萨 蒋扬钦哲仁波切无疑是最为出色的弘法者之一。

最近,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大陆版《人间是剧场》(新 星出版社,2010年10月)推出,此书的台湾版也在7月 刚刚推出,由此,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主要著作基本都在 大陆出版,包括**《正见:佛陀的证悟》(姚仁喜译,中国友** 谊出版社,2007年1月)、《佛教的见地与修道》(马君美、 杨忆祖、陈冠中译,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5月)、《朝 圣: 到印度圣地做什么》(姚仁喜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年10月),无疑是大陆读者的福气。

关于《人间是剧场》,无论文字还是内容,都令人动容。关于佛法,仁波切很谦虚,处处表示自己的不

第 10 页 / 共 36 页

足与缺陷,并说更应直接跟随佛陀的教导;关于文字,由于仁波切基本使用英文,因此我们无法以其中文译本加以揣度,不过从网络上流传的的音频开示来看,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话语具有简要与直接的特点,而且善用譬喻,层层论析下来,粗看简易,实则意义丰富,需反复体会玩味。在藏传佛教界内部,宗萨仁波切也是敢言敢语之人,他曾在讲座中说,他认为藏传佛教的这些仁波切都应至少谈一次恋爱,然后被拒绝,然后就可以真实明了"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真义,常人自然觉得匪夷所思,但对于破除常见种种教条主义的佛法,无疑也可算是一种对治良药。

在《正见》的序言中,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有这样一段谈话:

1982 年我首度造访中国,其后又有数次机会前往。每次我都注意到二件事:巨大的经济成长,以及愈来愈多人对心灵性和精神面的渴望。许多混杂了健身和民间信仰的新式宗教兴起,支持了我的观察。最近一次的中国之旅,当我了解到有多少藏人在内地教法之后,我开始感觉到急迫性。因为在西藏虽然还是有许多优秀的喇嘛,但是也有很多冒牌货。除非你能遇见具足佛教正见而且慈悲的具格藏传上师,他们真正关心众生的证悟,而不只是想号召大群弟子以便获取供养;否则的话,相当容易受到误导。

我并不纯然将这段话仅仅看作是佛教的现状与危机,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这个世界心灵危机的一个反映,

而且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的世俗化,同样也带来了一种"盲目且狂热"的地下信仰狂潮和"商业化式的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自问,这个世界何以如此?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为人称道的,不仅是其佛法 上的修为,还有其涉猎的领域,比如他也是著名的导演,也是唯一一位喇嘛导演,拍摄过几部影片,如《高 山上的世界杯》、《旅行者与魔法师》等,我曾看过《旅 行者与魔法师》,可以说,如果抛开背景介绍,我们 很难想象这是一部由僧侣执导的电影,但只要略作思 维,又能清晰感受当中的佛法洞见,宗萨蒋扬钦哲仁 波切不以形式出发,而以人生基本处境作为影片主 轴,难怪能让许多对佛法有兴趣的年轻人趋之若鹜。

相对于《旅行者与魔法师》而言,《转世小活佛》(Unmistaken Child)无疑是从内部描述藏传佛教的一部纪录片,该片是以色列导演纳迪•巴拉特斯(Nati Baratz)花费五年时间跟踪拍摄,获得大奖无数,该片记录的是寻找衮却格西的转世灵童的完整过程,对于藏传佛教之外的好奇者而言,自然有莫大的吸引力,但这部纪录片并不刻意夸张各种神迹或不可思议



的现象,反而不断突出衮却格西的侍者巅津梭巴的虔诚与朴素,这位外貌神似谢霆锋的侍者,在衮却格西 及其转世灵童之间,形成了一种让人难以言语的奇妙关系,即有人性的朴素展开,也有灵性的神秘铺陈, 让人看完,感动至极。

最近,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音乐家黄飞立口述的《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文婧执笔,三联书店,2010年10月)出版,根据执笔人的自述,她为何兆武执笔的《上学记》出版后受到欢迎,因此才有老师推荐黄飞立来作此口述史,也为中国的音乐史保留了一份记录文本,而同时让人悲伤的是,这类文本如今消逝地速度越来越快,领略民国文化人的气质,我们已再无机会。

公平而言,此书相比《上学记》而言,略为平淡,但是仔细读来,平淡中也有一些悲伤的情调,如黄飞立当年在耶鲁攻读学位,此前有两位中国学生,一位是黄自,大名鼎鼎,一位是谭小麟,是欣德米特的得意门生,但二人均早逝,在黄飞立准备回国时,欣德米特叮嘱黄,让其保重,免蹈另两位之覆辙,结果,虽经大难,黄飞立终于活下来了,他说:"我做到了。"

图 1 为 Matthieu Ricard 拍摄的西藏僧侣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在瓦当先生的《"其实我醒着常常睡不着"》(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里,看到28岁的陶学钢已于2010年8月意外去世的消息,心头一惊。陶学钢在《中国图书评论》和凤凰网工作的时候,我和他有过往来,虽然并无深交,但是一个曾经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仓促得让人目瞪口呆。瓦当这样写道:

暑热难耐,那天他独自在河滩上支了顶帐篷,睡在里面,半夜上游来水,他就这样顺河漂流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原本以为家乡可以抚慰他的创伤,没想到最终却成了他的埋骨之地。"走一步/看一步/脚指头/总是会犯错误……我就是这么着/常常犯糊涂/其实我醒着/常常睡不着"——这是小陶一首诗里的句子,如今读来,无比伤感。当初回到家乡的他想必更加孤独,更加格格不入,更加痛苦。小陶的悲剧看似偶然,又有必然,几乎所有得知他死讯的熟人第一反应都怀疑他是自杀。我在小陶身上更看到了无数从乡村走出的青年的影子:他们的精神属于城市,却无法在城市立身;他们已经没有了故乡,却误以为还可以回去;他们满怀改变人生和世界的光明梦想,最终却被命运的黑暗吞噬……在这个世界上,悲伤深了。

一个月之内,第三次听到噩耗。第一次是微博上的友邻、作家任兰心脏病突发而离世,第二次是诗人 马雁在上海的宾馆弃世。

我对马雁的印象静止在十年前的新青年网站和诗生活网站。当时网络初兴,诗歌网站的网友屈指可数,

互不相识却呼朋唤友。有次去北京,在网友聚会中见到马雁,在场的还有马骅。如今,两位朋友都已远去,偶尔在网上与他们的诗歌再次相遇,如同最初的相逢。**2002** 年,**23** 岁的马雁在《傍晚,看一场雨》里写道:"如同一把花伞。从四十米的空中,我看到/幸福,那些幸福。那些琐碎的,远离优美的东西。"现在的马雁,或许终于寻找到幸福。

认识任兰是在新浪微博,对她的了解也是通过微博。去年秋天,一家媒体在微博上刊出"摄影记者作品欣赏",便衣把一位倒卖车票的女性按翻在地、她的娃娃在旁边大哭,这家媒体对"可怜的孩子被母亲利用去卖票"表示谴责。任兰为这个母亲辩护,与一位网友争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任兰表示自己尊重那位母亲,"希望警方可以给她一些尊严,希望媒体不要把这种屈辱的场面当做胜利果实,兴高采烈地展现出来",同时批评自己"掐架","太不淑女了且耽误时间"。我认同任兰的观点,更喜欢她的认真和自嘲。认真是一种美德,自嘲也是一种美德,这两种美德很难并存于一身,但任兰兼具两者。

1918 年深秋,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出门之前,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说:"能好就好啊!"几天后,他投湖自尽。(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冬天依旧寒冷,温和的长平先生被要求离开他供职的南方报业。只有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又称"维基革命")稍稍带来一丝暖意,这暖意波及到北非和西亚,尚未抵达远东。2011年,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侯宜杰先生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3日)里追溯当年的景象: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孙中山不再领导实际工作,赵声病故,黄兴心灰,胡汉民躲在香港,不见踪迹,谭人凤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香港统筹部告诉两湖地区革命党人,广东失败,元气大伤,等待5年之后才得大举。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不到半年,辛亥革命爆发。

侯宜杰强调,辛亥革命不单是革命党的功劳,立宪派功不可没。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阅读"独立阅读"此前推荐过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

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宪政国家, 从这点来说, 立宪派根 本不存在"落后"一说,恰恰相反,立宪派始终领风气之先, 也因此倍受打击。1928年,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党国模 式"从广东蔓延至全国。到了三十年代,知识阶层包括很多法 学家,都对国家主义表示认同,甚至支持"新式独裁"。政治学 者张佛泉先生坚持宪政理念,撰写了大量文章予以反驳,这些 文章终于结集为《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0年9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编者、清华大 学博士生王进文,因家中房屋被拆迁致信潍坊市长:"我以及委 托我的村民并非是在向您乞求,而是在要求——要求您运用选 民授予您的权力去为他们的权利服务。"这封公开信表达了一个 公民维护个人权利的信念,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公民对于法治程 序的尊重,将会成为一份无法忽略的文献。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所属的"汉语法学文丛"陆续出版五年有余,收入张君 劢、燕树棠、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诸多民国法学家的著 作, 主编许章润先生功莫大矣。



许章润写得满纸精致文章,不愠不火又暗含机锋。他在《六事集》(法律出版社,**2008** 年 **9** 月)里夫子自道,"反感以'主义'定位,非要借用,则标榜文化保守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学术宽容主义、生活温情主义"。于我心有戚戚焉。稍有区别的是,许章润对西方"文化洗脑"忧心忡忡,我只对列宁-斯大林一系的西方"文化洗脑"保持距离,对其他西方文化抱"拿来主义"的态度。我更认同文化多元主义,在多元之中,我偏向文化保守主义。

主义组合的原型来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里申明:"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接着指出,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可惜这点补充常被忽略。丹尼尔·贝尔,生于1919年5月10日,逝于2011年1月25日。

假期已至,对学生而言,这是最幸福的时光,本来不应推荐课外读物,以免大煞风景。但是,这里还是忍不住推荐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这本书源于他为哈佛大学本科生教授的同名课程,视频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属于"全球开放课程"。

在桑德尔那里,公正不仅是抽象的理念,还是具体的问题,比如是征召士兵还是雇用士兵?如果不参与政治,你会成为一个好人吗?我们应当弥补前辈们所犯下的罪吗?团结是对自己人的一种偏袒吗?桑德尔不断地提出问题,而且尽可能呈现问题的困境,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桑德尔透露,自己的两个儿子,从能拿起汤匙的时候,就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问题。



前面都是沉重而且沮丧的话题,春节将至,不妨读读 刘植荣先生的《85%的人应该涨工资》(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0年12月),增添一点节日气氛。这本书的标题很鼓 舞人心, 让人振奋, 但是内容依然摆脱不了沉重而沮丧的 底色。刘植荣研究了 183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制度,指 出:"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 国家公务员工资,公务员给自己随意涨薪,而且涨薪是 GDP 增幅的 2 倍, 堪称世所罕见。"一方面是公务员和国 企工资高得"世所罕见",另一方面中国最低工资与人均 GDP 的比值, 排在世界第 158 位。他指出新加坡不是"高 薪养廉",虽然 0.03%的高官拥有高薪,但是薪水无法与 私企高管相比,99.97%的公务员工资低于平均工资,甚 至低于筑路打桩工,而且没有任何灰色收入和特殊福利。 这让我想起蔡定剑先生曾经解读"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他同样认为所谓"高薪养廉"有断章取义之嫌,进而指出 新加坡虽然以东亚价值观而著称,但关键还是"英国式的 议会民主制度、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起到基础作用。

沪渝两地的房地产税开始温水煮青蛙,我看到有不少人论证征收房地产税如何天经地义。如果回避"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只论证征收房产税如何符合国际惯例,这种论证与我们对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学习有异曲同工之处。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ENGLAND 英国

吾欲中产, 斯中产至矣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 sunxiaoji@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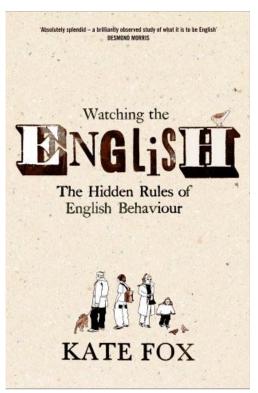
我遇到过的英国人似乎都有点"腼腆"。说他们腼腆,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人无论说话做事始终显得模棱两可,有时甚至过于谨慎,给人一种非常内向、不善交流的错觉。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原来英国人并非天性内向,或者不善言辞,只是他们的言行无一不遵从于英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套独特而繁琐的社交规则,而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这些规则难以理解罢了。换句话说,想要和英国人有深入的接触,首先就得适应他们这一套奇特的说话和行为习惯,并且还得按照这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来说话和思考。

作为读"人教版"英文课本长大的一代,我们从小就被老师告知,当你听不懂从老外嘴里冒出来的一连串英文单词的时候,应该对对方说"Pardon?",这在我们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英语常识,然而,在现实中,当我招架不住聊天中那一连串含混的英文,而随口说出"怕等"时,金发碧眼的英国小伙 Ben 马上讥讽我说话"很矫情"。我却自觉冤枉:连英文都没能听懂,哪还有闲工夫矫情?

一问之下,得知原委。"Pardon"这个词,虽然按照字面解释有"我没听清,请您再说一遍"之意,但 "Pardon"的原意却是指古代君主、主教等上层阶级对犯人的"宽恕"和"原谅",因此,当一个人说"Pardon"的时候,他就好像在咬文嚼字地说:"请见谅,在下未曾听清。"如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矫情"之嫌,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方式能够体现出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像"Pardon"这类英文,通常会出现在英国下层阶级的谈话中。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往往会使用更直白的"Sorry"和"What"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英国人不仅认为"Pardon"这个词是不妥的,同样,当你想管餐厅服务员要"餐巾"时,也只能用"napkin"而不是"serviette"这个装腔作势的法语词,否则也会被人视为下层阶级。推而广之,这样的道理也出现在英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中产阶级会把房间布置得干净整齐,但从不把屋子搞得珠光宝气,他们认为这是底层阶级干的事;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从来避讳露骨地谈钱,只有那些出身低微的下层劳工,才会对钱财斤斤计较……所有这些奇怪的英式"言行潜规则"被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凯特·福克斯总结为:一种英式的"伪善"。不过,这种"伪善"的背后,却牵连着英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民族理念和一套行为的"语法"。

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Kate Fox, 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 Hodder & Stoughton Ltd, April 2004)一书中,凯特·福克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把英国人各种难以被人理解的社交规则做了归类和总结,她认为,所谓的"英国性格"主要体现在英国人的



"社交拘泥症"。例如,人们说话时的用词总是那么节制、总是以自嘲为幽默,以及那种带有虚伪性质的彬彬有礼等等。这种看似"拘泥"的表现,从表面上看是体现出了英国人追求中庸与谦和,凡事小心谨慎的民族性格,然而这种民族性,千百年来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演变,那就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如何理解自己的阶级属性。

说来也奇怪,英国人对阶级的理解和人们通常采用的"按收入划分"并不相同。美国学者米尔斯在 1951 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曾提出,由于现代社会机械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小生产者逐渐让位于大型产业公司,这使得"旧的中产阶级"被新的中间阶层所取代。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更像是在描述那些生活讲究,收入不菲的白领精英们。但是,英国人可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询问自己属于什么阶级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点也不"唯物",而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简言之,那就是只要一个人保持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那么不论他收入多寡、地位高低,都可算作"中产"之列。"吾欲中产,斯中产至矣",我想,孔圣人设若生于不列颠岛,定能说出这番话来。

有了这种"人人皆可中产"的阶级观,那么一个英国人便不必如此在意他的收入和工作了,相反,保持一种中上层阶级的社交礼仪,成为了一种显示自己身份的"门面功夫"。但英国人也认为,这一桩"门面功夫"不能操作得过于刻意,以至于让人感到这是底层阶级的下等人在东施效颦,装模作样。假如被人目为此类,那对于一位地道的英国佬来说简直是比脱光了游街还要大的耻辱。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就对这一系列繁琐的"言行潜规则"尊崇必至,践行之时,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被他人抓住把柄,流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难怪萧伯纳当年讥讽说,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做了错事的英国人,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根据原则办事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在英国佬眼里是一位多么没有品位可言的"普罗列塔利亚"了。我平时总是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也叠得蛮好,但英国的室友看了,却觉得这简直是底层人刻意想证明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结果;当我穿着运动服慢跑的时候,胸前那醒目的"耐克"标志同样会被中产阶级视作大忌,正确的穿衣方法是不穿有明显商标的衣服;而当我试图帮朋友清理汽车凌乱的座位时,遭到了一口回绝,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汽车内需要一种"刻意"的凌乱;最后,我被这一套可恶的规则搞得忍无可忍,说了声我要回家(home),意欲离去,但梦魇立刻显现了,因为有人告诉我,有品位的中产阶级只会以"house"或"property"来指称"家",而"home"显然是下层阶级的一个词汇……

但有时我会怀疑,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到几乎"变态"的阶级观念的社会,到底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凯特·福克斯在书里这样为英国人的阶级观辩护:"英国基于阶级或出身的社会体系,与美国'精英统治'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前者的体制下,有钱人与有权人会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套"英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社会潜规则是否必然会培养出英国上层人士的社会责任感,本文存而不论,但至少,这样恪奉规则的社会无疑能让人具备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并不取决于他的收入,而是由他的言谈、礼貌、行为习惯决定。

诚如凯特·福克斯所言:一位操中产语言,用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做事的人,即使穷困潦倒、面临失业,但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相反,一位说话粗俗,毫无品味,行为鲁莽的人,即使腰缠万贯,他也是个下层阶级。如今回到国内的我,目睹周围种种,再回读她这番话,不仅丝毫不觉得英国人虚伪,反而切实感到了他们的真诚。

BOOK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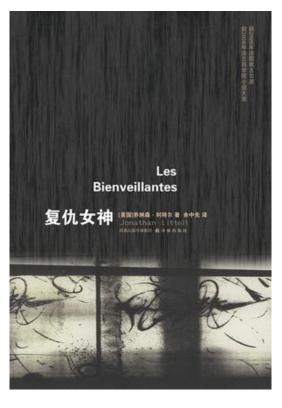
一部关于恶的百科全书

特约撰稿人 扬克

(德国·图宾根, <u>asukashinjirei@gmail.com</u>)

关于二战、关于纳粹的作品确实足够多了,德国人自己通过文学的方式做出的忏悔就数不胜数,以至于许多人早已厌烦那些以此为母题的小说。他们有理由认定,关于那段黑暗历史了解得足够多了、反思也足够多了。在阅读《复仇女神》之前,我或许也会对这样的观点表示认同,对那些在安逸的日子中轻浮的心灵表示理解,但在读完这个血腥的故事之后,我只能对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大肆嘲讽:那些恶的事实,别说了解它们如何发生,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们会那样发生,它们中的一丁点小碎片就会把我们安稳甜蜜的小生活击得粉碎。

《复仇女神》,这正是我要在此评论的作品。它不是史书,也非纪录,但作者为了写作阅读了两百多本关于纳粹的著作以及大量二战档案,走访了德国、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在另一种真实的含义上记述了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在德国东部战场以及大屠杀过程中的真相,德国人称其为不是历史式的小说,而是历史本身的小说。作者乔纳森•利特尔不是德国人,而是 19 世纪末就到达美国的波兰犹太移民后裔,但并非犹太



人身份促使他做出对纳粹德国的谴责,他反而说犹太血统于他只是一个历史背景,甚至在访问耶路撒冷时直言以色列不断在政治上滥用大屠杀的历史。小说又不是用英语写就,而是法语,不需要用它所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和龚古尔奖两项桂冠来证明它作为法语文学的成就,有敏锐的评论者早已发现它与法国读者的另一重关系: 开场白中主人公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杀十偿一的屠杀行为与纳粹相比较,这无疑是对法国读者的挑衅,作者在提醒他们: 嘿,这可不是你们对悲惨的过去表示人道主义关怀的好机会,同样的恶也流淌在你们民族的血液中。更不用说主人公提到他那些巴黎高师出身、成为维希政府高参的法西斯好友,让我不能不联想: 所谓战后的法德和解可不完全是被欺凌者的宽恕,法国人本就沾染了那些罪孽。

1967年出生、2001年动笔的利特尔,其人生轨迹与二战已间隔相当距离,写作动机则又与他的美国人身份相关:其父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将一生投诸到对 KGB、CIA 的肮脏勾当的研究中;童年时利特尔最大的恐惧是有一天被送到越南去杀死小孩,他还常常问自己:"如果我不是生于1967年的美国,而是1923年的德国,我会变成什么样";27岁时,利特尔加入了国际"反饥饿行动"组织,曾在车臣负伤,他的妻子则是"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因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决定脱离美国国籍加入法国。这一切背景都让作者显得是位品行高尚的道德楷模,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人们难免揣想,他是否会在那本砖头般的小说中塞满道德谴责和说教。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作者在做出挑衅,最大的挑衅却是针对自己——小说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这个"我"可不是爱上某位纳粹女帮凶的懵懂少年,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卫军高级军官。选择这样的视角,利特尔无疑在进行冒险,他必须强迫自己进入一个纳粹的心理历程,有多少人能这

样想象呢?他却做到了,以至于有法国评论者认为,主人公的所有想法其实就是利特尔本人的想法。

像一个纳粹那样去思考,不仅仅是作为名叫马克西米连·奥尔的主人公,还有面对他的无数纳粹同事, 艾希曼、希姆莱、施佩尔,这些传说中恶魔般的人物一个个鳞次登场,作者必须从一名纳粹的角度去理解



他们,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入恶的核心,理解恶是怎么一点点滋生、蔓延。对于读者来说,跟随这一步伐将异常艰难,所以这不是一本好读的小说。首先翻译成中文仍多达八百页的篇幅就让人望而却步,即便很快跳过开场进入正文,读者也会随着德国东线部队在波兰、乌克兰直到苏联的滞重脚步很快陷入到战场的狼籍、道路的泥泞和尸体的恶臭以及接二连三的人名、混杂的党卫军与国

防军军衔及部门和层出不群的军事指令之中,读者将来不及称赞小说为了刻画战争细节作出的辛勤努力就不免心生厌烦。但我必须建议那些有心了解人类这段史无前例的黑暗往事但又不可能像作者那样阅读数百本相关著作的人,保持巨大的耐心,坚持下去。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一部关于恶的百科全书,它确实超出了单纯小说所能承载的重量,因此不适合那些仅仅追求精致文学趣味的人,举凡与这场战争相关的一切,军事、政治、哲学、文学、音乐、医学、地理、营养学、工业经济乃至语言学,都被作者以惊人的驾驭能力嵌入小说的情节框架之中。诚然,作者常常不知节制地任由人物铺陈自己的论述,大段对白连篇累牍,这不得不要求读者拥有一份知性上的好奇,要知道,这段恶的事实并非简单的杀戮与破坏,而是一个杰出民族倾尽所有的才智造就。

马克西米连·奥尔,因此被作者赋予一个典型的纳粹军官身份,法学博士,热爱哲学、音乐、文学,拥有莱蒙托夫式的英雄主义情怀,不无人道主义精神,引用德尔图良的拉丁箴言而非罗森贝格,但同时坚决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还有着错乱的性欲。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个词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异常醒目——高加索山区犹太人部落的一位长老见到他时开口就用古典希腊语与他交谈,因为确信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他亲手将其杀死。更为特殊的,他还是一个法学家,奥尔自嘲地说,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才会选择一位法学家不经诉讼就去杀人,但决定参加党卫军前线突击部队却是他的自愿。党卫军不是一群嗜血杀人狂的乌合之众,反而汇集了德国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他们大多自愿参军,而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清理"犹太人。小说一开始就遍布屠杀场景的描写:在战争初期犹太人都是交给前线突击部队就地解决。这些用一行行文字逐帧扫描过去的场景或许比我们在任何大屠杀电影中所见的直观画面都要触目惊心:四岁的女孩来哀求奥尔,母亲已经死在屠杀的土坑中,他用乌克兰语安慰了她几句,将她抱起来交给一个士兵,等待着的是一排枪声;男孩小雅科夫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奥尔甚至托人从后方寄来法国音乐家拉摩和库普林的罕见乐谱,想让他了解那种不同寻常的美丽,但他的手压坏了,没法弹奏钢琴,失去了继续留下来的价值;奥尔在坟坑中见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几乎赤裸,子弹穿透她的胸膛,奄奄一息,他被那双眼睛紧紧抓住,想蹲下去擦拭她额头的泥土和汗滴,但结果是一阵痉挛的射击;一个黑发的姑娘,捆绑在绞刑架下,所有士兵和军官排队上去亲吻她,"有些人吻得很温柔,几乎很贞洁",最后他

们把她吊死了。这些诡异的屠杀场景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在唤起恐惧之时,却也让他们意识到心底那丝无耻的好奇,与生俱来的对于血腥的好奇,就像广场上的乌克兰孩子们偷窥被吊死的女尸裙底,难怪作者还要引用《理想国》中的故事来描述人性的这一痼疾。

诚然,作者也叙述了党卫军士兵在执行屠杀时产生的巨大心理不适,没有泯灭天良的军官对抗那些虐杀成性的同僚,他甚至说:"我们的士兵即便再粗野,再随波逐流,也没有一个人在杀死一个犹太女人时会不想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或母亲,在杀死一个犹太孩子时会不看到自己的孩子似乎就在眼前,就在坟坑中",他们的一切狂暴行为都显示出,"他人存在着,作为另一个人,作为一般的人而存在着"。然而,正是意识到他人作为同类的存在让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屠杀正是在这一意识存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人,如何在内心同时容纳人性的尊严与毁灭他人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历史上人们为此找到过种种理由,纳粹的理由甚至显示出人类文明的高级成就,那就是对法的权威的绝对尊重。事实上即便党卫军内部也对屠杀犹太人存在分歧,比如奥尔的上级奥伦道夫对"元首的灭绝令"的异议,他还期待一种"更人道的办法",但每个人同时又无条件接受这一定律:元首的指示具有法律力量。这句后来因为艾希曼的辩词为人所知的话在战时德国像一条"未成文法"一样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础。作者没有将德国人对它的遵从视作简单的普鲁士式服从,这样的批判在他看来反而减轻了他们的罪恶:德国人不是像没有头脑的奴隶一样盲目服从,而是出于一种绝对的智性选择。借奥伦道夫的口作者表达了这一带有很大挑衅意味的观点:就像亚伯拉罕服从上帝毫无理性的命令,就像犹太人听从上帝的旨意,"去打击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德国的智识精英们也如此服从元首的命令,将其看作人民意志的化身。

用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为屠杀提供工具,这个悖论在高加索山区的清洗行动中达到高潮。党卫军希望通过历史语言学的成就找到山中犹太人与远古犹太人语言上近亲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具有犹太血统而非仅仅皈依了犹太教,从而获得屠杀的合法依据。历史语言学,19世纪德国最灿烂的智慧结晶之一,蒙森在《罗马史》开篇就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她追索那些湮没无闻的远古遗迹,时至今日优秀的西方古代史学家能够通过娴熟地辨析几个古典词汇的变形恢复古代社会的原貌,但它确实曾不折不扣地成为纳粹的杀人工具。杰出的智识与肮脏的罪恶并存,不仅如此,人的审美精神也与肮脏并存:《钢琴家》中传达的音乐声中的和解



在利特尔笔下压根不存在,废墟中的留声机演奏着格鲁克的《俄尔普斯与欧律狄刻》,"微妙,缠人,忧伤得可怕",而苏联人的尸体就躺在一边;在集中营中奥尔刚看完那些令人作呕的场面,忽然欣赏起四周的风景,高大的桦树,清爽的空气,让人觉得干净舒服。屠杀就在丰富的学识与优雅的品味之下发生,让人困惑于人性的错杂。书中四处可见的关于排泄的描写正可以象征人类这一矛盾的境地:奥尔梦中止不住的大便,快被填满的粪坑,黑乎乎一大片的蟑螂,肛门里喷出的各种奇怪生物,粪坑里伸出一支帮纳粹擦屁股的手。帕索里尼在《索多玛与蛾摩拉》中运用的象征被作者发挥渲染到了极致。

显然,利特尔不愿意将纳粹的暴行视作德国人特有的罪恶,不愿视作某条特殊历史道路导致的灾难,我相信,在他看来,那样的反思只是把恶归入某个历史的误区,想就此与恶撇清干系,而他所做的,是在逼迫人们共同背负罪的重负。对于艾希曼的描

写,尤其体现了作者如何理解一个有着正常理智、良好修养和杰出能力的人怎样主动作恶。在作者笔下,艾希曼不是"人类的敌人",也不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化身,一个碌碌无为、只知服从的机械人。艾希曼在家中举办温情脉脉的家庭聚会,一群脱掉军服的纳粹军官演奏轻松宜人的音乐小品,他的音乐品味相当不错,对巴赫的评价甚至颇具讽刺意味:"有些干巴巴,太……精于算计。"在餐桌上,作者安排了一场他与奥尔之间的哲学对话。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读起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他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与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相违背,奥尔此时将那条"未成文法"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于是绝对命令变作:你要如此行为,以至元首知道后也会赞同你的行为。元首指示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人民意志是一切权利的惟一基础,为元首效劳,不是因为他是元首,而是因为他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奴仆。这番哲学诡辩如今听来还是如此耳熟,经过精心的理论修饰后仍旧能以一种日耳曼式的论证力让一大批智识阶层心悦诚服,何止昔日的艾希曼。更何况他不仅用自己的理论理性为恶行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的实用理性也让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无时无刻不寻求效益最大化,他在那个工作岗位如鱼得水,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创造性,动机与目的与一个企业中适得其所的中层管理者无异。对犹太人没有特殊的仇恨,也确实和很多党卫军高层一样认为灭绝计划是个错误,但当一个体系将自身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此之上后,他所做的就像任何一个"审慎的中产阶级"一样:努力让自己有机地融入这个体系。艾希曼和许多纳粹一样,不是恶魔,也非庸才,但正如此,他们显示出人性之恶是何等根深蒂固。

也正因此,利特尔不仅将德国的侵略称为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自然延续,也提到德国战败前夕美国为了使其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与之进行的私下交易。在某种程度上他将德国的罪恶视作现代性病灶的集中迸发,所以行文中融入不少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些甚至来自亲纳粹的理论家。他提到卡尔·施米特对总体战争的批判:当国王的臣属都变成公民之后,即国家民主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再是贵族之间一种有限的典礼游戏,而是全体公民之间你死我活的整体战争;他对集中营的描写,精确的统计学计算,高效的工业化流程,也无不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所说的集中营与现代化大工业本质相同。而在所有的理论延伸中,最精彩的无疑是奥尔在斯大林格勒与一个被捕的红军政委之间的对话,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政治符号上的相似在他们的对话中深入地表现为现代两大极权体制在核心观念上的一致:阶级斗争与种族灭绝,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伦理,客观敌人的存在,大清洗,造就新人。卡廷=奥斯维辛,绝非偶然。

作者的描写和叙述是残忍和冷酷的,他毫不回避这段黑暗历史中那些最不堪入目的场景:集中营士兵偷偷寄给家人的黄金,用犹太人的金牙熔成,拳头大小,来自十万具尸体;集中营军官的妻子穿着精致的蕾丝内裤,来自富有的犹太女尸。不过作者的文学才华并不表现在对上述集体和体制之恶的描述上,他更大的努力是在剖析主人公奥尔的心理变化,追踪一个本来心存仁念的人道主义者如何陷入恶的深渊。这一对准个体的探索无疑试图探及恶最隐秘的内核,因为恶行终究归因于内心的决断。书中存在大量对奥尔心理的意识流式陈述,对其梦境和想象的超现实刻画,他对失踪父亲的怀念,对母亲与继父的仇恨,与姐姐的不伦恋,错乱的同性恋,弑母,这一切构成了个体之恶的畸形背景。但作者的努力不算成功,对恶意最初一刻如何在内心萌发,他不得不付诸阙如,事实上这也是人面对这一未知之幕的必然困境,正如康德所坦承的,恶的意志来自何处,我们始终无从知晓。

西方思想传统中对恶之来源的追问由来已久,不仅出自基督教的神义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已在叩问恶的本质,但无论是后来莱布尼茨系统构建的神义论(Theodizee)对恶的神学式解释,还是尼采反基督教的生义论(Biodizee)对恶的美学式辩解,在奥斯维辛之后都分崩离析。汉斯·约纳斯所问的"奥斯维辛之后上帝何为"与阿多诺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人在面对恶之根源问题时的无解境地。但如果不想陷入人类厌恶症的虚无之中,就必须以理智的诚实和道德的勇气面对那些恶的事实,只不过人类亲手造下的恶的事实是如此庞大,以至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的理论解释

都会淹没在它黑色的潮水之下,更成问题的是当恶成了理论研究的对象,它就似乎与作为客观观察者的主体截然分离、毫不相干了。所以人们并不是偶然才持有这样的观点:面对恶,理论是乏力的,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对其做出整全的呈现。利特尔作品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此。

图 2 为利特尔,图 3 为艾希曼。

[美] 乔纳森•利特尔:《复仇女神》,余中先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58元。

BOOKREVIEW 书评

民国教科书与党化教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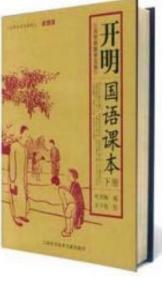
2005 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了三种民国教科书:《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这套书当时并未引起关注,但在五年后成为媒体的焦点,一时民国纸贵,**2010** 年 **12** 月 这套书再次重印。

从版本的角度来说,这套影印本并不理想。因为影印本重在保存历史原貌,但是这套书的编后记里写道:"考虑到今天学生的阅读习惯,我们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同时,删去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相比之下,开明出版社重印的《开明国语课本》保留了1932年版的所有内容,更具参考价值。

在影印再版的三种民国教科书里,媒体最为推崇的是叶圣陶编、丰子恺绘的《开明国语课本》,我个人最为偏爱《商务国语教科书》。《商务国语教科书》初版于 1917 年,《开明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初版于 30 年代。这之间发生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党化教育。

《商务国语教科书》初版之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尚未对教科书构成冲击,因此这套教科书以文言为主,但又不以佶屈聱牙为长,而是文浅显、意深远。比如上册第 49 课《合群》:"群鸟筑巢,或衔树枝,或衔泥草,一日而巢成。"上册第 50 课《爱同类》:"一犬伤足,卧于地上,一犬见之,守其旁不去。"《开明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都以白话为主,但当时白话文写作尚未成熟,很多课文一览无余。





比如《开明国语课本》上册第 11 课:"大家画牛。 先画牛头,再画牛身体,再画牛脚。"上册第 12 课:"大家写牛字,一,二,三,四。大家写羊字, 一,二,三,四,五,六。"上册第 167 课写接力 赛跑的课文,和我们从小常见的运动会作文几乎 没什么区别,"我是同伴里的一个,应该尽力快跑, 快跑,我和一组的胜败相关,不要牵累了同伴才 好。"或许,小学生优秀作文的原型正是这些教科 书。

更需要检讨的是,《开明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均受到党化教育的影响。**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之后,将在广东实施的党化教育推广到全国。《开明国语课本》上

册第 134 课、下册第 9、10、52 课,《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册第 38、131、132、133 课、下册第 18 课都是关于领袖的故事。《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册第 38 课,插图是一群小朋友站在孙中山的遗像前,课文是:"他是谁?他是谁?他叫孙中山。"《商务国语教科书》下册第 51 课《偶像》却是一篇讽刺偶像崇拜的文章:"人有以木斫偶像,设肆于市鬻之。无过问者。乃大呼曰:购像者当得巨富。市人曰:君胡为不留之,以自富其家。斫人辞穷。"因为这是一篇初小课文,就不翻译成白话了。

商务印书馆高小国文教科书确定十一点特色,略举一二:第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第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第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第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略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开明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分别收有两三百篇课文,按照比例来说,领袖的故事不算喧宾夺主。但是,今日媒体对这些教材热捧的时候,对此几乎反思,未免有些遗憾。

事实上,值得影印的不仅有《商务国语教科书》,还有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这套教科书基本符合公民读本的标准。只是希望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时候,能够保留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

《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78元;

《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出版社,2011年1月,118元。

ART 艺术

本雅明的废墟与柯林罗的拼贴

观察员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 @gmail.com)

在费多拉这座灰色石砌都城的中心,矗立着一座金属的大厦,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金属的圆球。你如果查看圆球的内部,会看到一个蓝色的城市,一个不同的费罗拉的范本。如果出自某种原因,这座城市没有变成我们今日看到的样子,那么,这些范本或许就会是这座城市的形式。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凝望那个时代样子的费多拉,设想将其变作理想城市的方法,但是在他制作微型模型的时候,费多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一直到昨天还是某种未来样式的事物,却变成了一个玻璃球里面的玩具。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孔隙不仅仅是由于南方艺术家们的怠惰,而首先是由即兴创作的欲望造成。即兴创作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空间和机遇。建筑物被当作大众舞台来使用,这些建筑物被划分为无数个同时活跃起来的剧场。阳台,庭院,窗户,门道,楼梯,屋顶,同时都是舞台和包厢。

——本雅明《Reflections,那不勒斯》

记得当初读本雅明的时候,老师反复提醒我:ruin(废墟),对于本雅明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看了老师推荐的 The London Nobody Knows,翻到了那两本由中田薰写的《废墟本》。看着那些在书本和影像中呈现的废墟,我直觉那当中包含着某些可称得上宝贵的东西,可究竟是什么呢?当时的我,认为自己需要置身于废弃的医院或是剧院当中才会明白。

就像读书一样,照片永远无法替代原作, 尤其是那些教堂里的壁画。同样,对于场所, 建筑或是城市的亲身勘探亦无可替代。只是, 当我读到上面那段本雅明对于孔隙的论述之 后,某些过往的经验在一瞬间涌了上来。那 一刻,我仿佛回到了自己曾游历过的那些小 镇,那些自己曾莫名就恋恋不舍的旧屋。我 想,我终于明白那一直暗地里吸引我的所在。

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我不止一次地见过那些被废弃的房屋乃至教堂。旧的教堂在原址破损败落一地,新的教堂以开发的名义在附近的别处急速重建。教堂的废墟与周围



的居民新居常常形成强烈的反差,以致刺眼。清理废墟似乎显得理所当然。可是这样的废墟,不也正是某种孔隙么?某种会像黑洞一般将你吸纳进去的时间孔隙。正是由于废墟的存在,我被提示了关于这一场所的某个过往。假若我再有足够素养,可以从废墟中看出某些时代的蛛丝马迹。那么,这便意味着我已经独自展开了一段位于时间轴之上的旅程。废墟,是起点;临近的居屋是终点。而这旅程的轨迹并不线性,绝不唯一;没有人知道我究竟踏上的是怎样的旅程。我亦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到废墟,重新开始另一段旅程。

这样的旅程,就像是折叠的纸扇,亦是可在手中把玩的卷轴画——起点和终点早已明晰,一切的起伏 跌拓却是全藏于 unfolding 这一过程当中。古人先贤对于生活,对于时空的理解,实在不可小觑。

也许,对于废弃之场所或建筑而言,一个更为常见的场景是:它们被周围的居民略作修补之后而改作他用。一个多月前,我就曾应朋友之邀,去帮忙参谋某个酒吧是否值得拿下加以改造。进门之后,我惊讶地看到这间异形的酒吧竟然是在一个废弃的宾馆锅炉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蒸汽管在十多米层高的空间内不规则地延伸,勾勒出一个个奇形空间;管道交接处依旧保有几个近乎簇新的气表,这让我很有些浮想联翩。之前的酒吧主人对于这些管道所采取的策略是"围";我和同去的朋友则都在想着如何"融"。

不管是"围"还是"融",重要的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进行着(前文所引的)本雅明所谓的"即兴创作"。并且,我们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一种可被称为修补的方式——依托了蒸汽管道本身。修补,在法语里

是 bricolaeu,而对应到英文却就成 bricolage (拼贴)。拼贴一词,在当下已与艺术创作纠缠不清。可是当我们回到最为质朴的生活层面,那些生活中琐碎的修修补补不也是一种拼贴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恐怕都会记得儿时自己或父母衣服上的补丁吧。再不济,现在去到贫困的山区,补丁亦是随处可见的。不难发现,即便是母亲的补丁也可以是某种即兴的创作。宝蓝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若是手边还有颜色相近的布料母亲自然会选择颜色近的,可是当手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相近的布料,母亲也就不得不即兴发挥了。有时候,这样的即兴创作是很美很具艺术感的,而那时候所有的小学语文课本都把这个称作为:母亲的心灵手巧。

最早读到 Bricolage 这个词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里。在他看来,许多神话都是基于某些"先在"(pre-existing)的事物或是经历,进一步想象渲染而来;从而,我们得以有机会去观察或分析这一渲染生长的结构。同源与同构,不仅仅在生物学上值得区分和关注,在神话学人类学当中同样如此。至于德里达更是进一步在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中写道: "If one calls bricolage the necessity of borrowing one's concept from the text of a heritage which is more or less coherent or ruined, it must be said that every discourse is bricoleur。"德里达的这一拓展,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如果要就互文性展开,势必涉及巴特、热内特、利柯等一大批法国学人,故而在此我只想点出:從互文性的角度来切入建筑学中的 Contextualism 应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之所以引用德里达的这句,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其中的两个关键词: heritage 和 ruined。

不用我说,從 ruined 到 ruin,我们又一次地回到了本雅明,而遗产究竟是被继承还是被废弃则是 Boym 在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中集中处理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文会稍加提及)。我想着重提出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谓 pre-existing things 和德里达的 heritage 对于理解拼贴的重要性:无论是"先在"还是"遗产",都说明了拼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源或本,可能是某个点,同时也是某种结构。而所谓的拼贴,是需要以这样的本或者源来作为依托。尽管,在许多拼贴当中,它们可能消隐不见,但却一定存在,且是可以经由暗示而被感知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拼贴不是一种纯粹随机的混合与抽象,而更接近于广袤大海之中那些看似孤立的岛屿。在水面上彼此隔绝,在水下却血脉相连。

正是基于此,我更倾向于从柯林罗的"透明性"出发来理解所谓的"拼贴城市"。既然,"透明性"远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通透明晰,更是交叠互渗之下的不通透与不明晰,那么"拼贴城市"也就不能简单等同于某种建筑或是街区的(暴力)并置。看上去也许色彩斑斓,蔚为大观,但却无法暗示某种更加深层的可能,无法形成本雅明所谓的"孔隙"。

不幸的是,无论是现在的艺术还是现代的城市生活都正日渐失去拼贴中所包含的修补维度,沦为简单粗暴的场所并置——这一并置的终极呈现正是杀死街道的 supper mall。于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城市生活可以被简单地看做一个由工作、餐饮、娱乐、购物、休息(居所)拼贴而成的拼盘。当一个人每日开了车去高档写字楼上班,不时出入顶级餐厅,闲时去商城购物,去看最新大片,入住高尚住宅区,这样的拼盘常常会被当作某种缤纷多彩的城市生活拼盘典范在各种媒体予以呈现。可试问,有多少人会去剖析以上各种场所,物件之间的关系呢?是否有人会问:作为一块"补丁",顶级餐厅和高尚住宅区对于所谓的生活(pre-existing)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或者说,我们是否有选择其他补丁的可能呢?会不会当我们在pizzahut 点了一份土耳其海鲜 pizza 之后,发现我们想吃的其实只是大饼蘸酱?



当然,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中主要谈论的是城市的建筑拼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市建筑形态的多样化。吊诡的在于,一旦这一多样化变成一种刻意的多样化,而非是基于 pre-existing 自然生长出的多样化;这样的多样化也就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单一化一一唯有多样化的合法性被认定。同样的逻辑,亦可以用到本雅明的废墟之上。当地震灾区的某些废墟被刻意地永久保留,它们事实上也就不再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废墟与孔隙,而成了

ideology 之下的纪念物(monument)。虽然在物质层面同样表现为建筑的残骸,但对于纪念物而言,我们由它抵达当下(here-and-now)或是由当下返回废墟的旅程(路径)已经被 ideology 所规定,已经被限死——这同样是拼贴表皮之下的单一。

无论是那些刻意为之的废墟,还是如今开发名义下遍地开花的古镇建设,其实都指向了 Boym 笔下所谓对某一完整(城市抑或田园古镇)形象的创造。在这里,完整意味着单一,也意味着对本雅明之"孔隙"的抹平。这个时候,比如当我们面对某一古镇、田园的时候,我们手里所握的并非是一把古老的折扇,而是一柄表面光滑鲜亮的尺状镇纸。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本文最初的引言吧:"但是在他制作微型模型的时候,费多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一直到昨天还是某种未来样式的事物,却变成了一个玻璃球里面的玩具。"不论我们所凝视的究竟是过去的费多拉还是想象中未来的费多拉,模型所通向的常常是乌托邦,是单一。当它们在现实中被呈现的时候,往往会成为一种 non-place。在那里,人们找不到归属感,也无法在拐角处遇见生活中的即兴与修补,遇见真正的拼贴。

注:文中的两幅照片所呈现的,正是我心目中有温度的拼贴。版权归属于 Mango 同学,特此感谢。

ART 艺术

为什么我喜爱宋庄甚于 798?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798 距寒舍仅两站地,它里面的咖啡,曾是我的私人会客厅,不仅约会、采访、聊天,一度连写作,也喜欢在咖啡里耗着——抬头看烟囱,低头敲键盘。而宋庄离我的距离,至少有一个半小时车程(还是顺利的情况下),这在居大不易,出行更不易的京城,无疑意味着不菲的交易成本,阻碍着城里人对它的"链接",但近半年来却成了我的念想。虽然难再做"客厅"之类的奢侈之想,但偶尔过去看看,却总像回了趟家似的。这说明了一个单纯的事实:咫尺之遥的 798 正在淡出我们的心灵,而宋庄则越来越近。

关于 798, 首先笔者应为以前的"误判"道歉,并修改有关结论。5 年前,我在《新京报》撰文(《"仓 库生活"能爽多久》),就彼时甚嚣尘上的所谓拆与不拆的艺术区前途之争,曾做出过"在永远由权力与资 本联袂叫庄的局子里,艺术家只能充当无关宏旨的可怜筹码,被礼送出局只是时间的问题。说具体点,那 些尚未出局的幸运者也许只是尚未进入城市建设规划的辐射半径而已,一旦资本到位,必被圈入。到那时, 艺术家将不得不再次腾空产业工人们为他腾空过一次的仓库"的判断。作为当时比较"出位"的声音,还 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

回过头来看,笔者当时确有对艺术本身的资本化能力,其参与、构成,乃至拉动经济泡沫化的一面估 计不足之嫌。但是,798没拆,不仅没拆,反而作为"艺术区"而坐大的事实,与其说是艺术的胜利,不如 说是艺术资本的胜利——艺术成了一个概念、一个包装、一个被拿来说事的事由、一个华丽的空壳,取代 (或者说重新包装了)原来的地主、城市规划官员和开发商脑子里的开发模型而已。如果真是艺术胜出的 话,艺术家们本应当在原来的由旧厂房改造的工作室(Loft)里快乐地栖居,享用晚上30分钟即可杀到后 海的低廉交易成本,而没必要再次动迁,到草场地,到环铁,到宋庄,再次以自己的艺术生活方式和创造, 把一片又一片荒僻的处女地变成"城乡结合部",从而为下一轮城市化进程和地产景气储能蓄势、添砖加瓦。 而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如此博弈一圈下来,能落着什么呢?除了流浪,还是流浪。

正因此,笔者曾谈过"中国前卫艺术应该悠着点"的问题。为什么要悠着点呢?因为艺术家的根本目 的是做艺术,而要做艺术,就要做长,梦想一生做艺术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而想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生 做艺术并能做下去,生于艺术,终于艺术,断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甚至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一个最基 本的条件,艺术家需要一个由观众、收藏者、评论家及材料、模特等资源供应商构成的良好的、稳定的艺 术生态。除此之外,还不能离城市太远,因为本质上今天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以表达城里人的感觉,或人面 对城市时的感觉为题材,他们需要都会生活的接点,以定期获得、补充新鲜的刺激,彼此之间也不能相隔 太远,最好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因为做艺术,是一种高度孤独的职业,纵然人再有定力,也需要交 流,所以艺术家的群居现象,多少有些类似原始人或某些动物,基本上是生存本能的选择。艺术家之被称 为波希米亚人群落,其实也不无类似语境。而客观上,艺术家的群居对画商、评论者、新闻记者们也是一

际成本",可一石多鸟。

四、五年前的798,满足了 这几重需要,一时间成了波希米 亚圣地。然而遗憾的是,在空前 的"中特主义"发展速度的冲击 下, 权力与资本联合坐庄的结 果,今天已成了跨国垄断资本狂 欢的道场。尽管国际知名艺术机 构纷纷进驻,但拿艺术说事、以 前卫包装商业的氛围日益浓厚, 除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 顶尖者外,普通艺术家和广大艺 青事实上已经出局。当尤伦斯艺 术中心以60元的门票价格和着



两百元一件的印有艺术家作品图案的 T 恤叫卖的时候, 我觉得"前卫艺术"(其实是曾经前卫的艺术)已成

了道具,我情愿去中国美术馆看官方策展的双年展。

而与之相比,宋庄好哇,好在还很纯粹,原生态。这里,虽然也不乏在国际商业拍卖中成功的大鳄和教父级评论家,但有更多默默无闻的艺青,没有类似 798 的那种无形的"准入"门槛,是一个"平等"社会;街上隔三岔五有"跑行为的",但基本属于自发性的,观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不像 798 那样专门在展览的开幕酒会上,表演给手握高脚杯的中外来宾和媒体记者看;晚上,街头的馆子照例很热闹,但啤酒多为在城里餐馆中几乎已绝迹了的"普京";酒过三巡,会有即兴诗会,把 T 恤搭在肩膀上,赤裸上半身的圆明园时代的流浪画家、诗人粉墨登场。

说句首都的糙话,"前卫"如 798 者,艺术就剩下了装 B;而 50 里外的宋庄,艺术还是波希米亚人的生理需求。我也不知哪个更前卫,但对我来说,艺术无疑是更加接近生理性的东东。

图为宋庄广告。

OBITUARY 逝者・史铁生

被流星砸中之后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上海, <u>xiayouzhi1997@gmail.com</u>)

多年以前有位年轻人,在中学里教物理,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准备出国留学。机票买好了,就放在腰包里,他下班后去看了一场歌剧。歌剧散场,他骑车回家,经过一个包子铺,想起没有吃晚饭,就下车排队买包子吃。轮到他时,只剩下最后一个包子了。吃了这个包子,年轻人继续往家赶,路上碰到熟人,于是捏闸打招呼,不留神车轮轧上一只茄子。他摔到路中央,路过的汽车紧急刹车,但是晚了。立刻送进医院,推往手术室。年轻人以为这无非幸福生活上的一场虚惊,鼓励医生说,您大胆干吧不要发抖,我莫非要是哼一声就不算是我。



医生说,我希望您从 今天起尤其要时时保持这 种勇气。

看到这里,我已经知 道了结局。这故事是史铁 生编的,但有很多细节取 自他自己的经历。故事里 的年轻人后来没出成国, 反而高位截瘫,终身瘫痪, 整天躺在床上推算自己碎 开车祸的概率。不是每个 人都有戏剧性的遭遇,也 不是每个人都有史铁生那 样不幸的经历,但我们李

时刻,不知道其他人怎样,我反正像故事里的年轻人一样,仔细推算过不幸发生的概率。和他如出一辙, 我的结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避免。

无数个选择可以让我们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自己却成了一个被流星砸中的倒霉蛋。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气得浑身发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无理由的不幸差不多是一切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母题。如果人类生来都四肢康健,吃用不愁,像瑙鲁人一样,被鸟粪和矿石所围绕,生来注定虚度一生,我们就没有诗歌可以吟诵,也没有一切形而上的烦恼。那样我们的智力就不会进化到今天这种程度,对痛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敏感。

当然,我没打算为人类的智力进展牺牲自己的幸福,正如我父亲没打算为某个狂人的革命事业饿肚子, 史铁生没打算为写小说就自甘承受残疾的代价。痛苦不请自来,我一边推算概率,一边盯住一个问题问个 不休:被流星砸中的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恰好是我?我和其他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流星没有砸 在隔壁王小乐的头上?

我对史铁生的阅读,就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或者说,是他提醒了这些问题,使其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作为中国人,我们更熟悉另一种理解痛苦的角度,即把它们看成是人性的后果——就像古代希腊人那样。《伊利亚特》是从阿喀琉斯的愤怒起笔的,因为古代希腊神话也把冲突和不幸归因于人性,归因于人的嫉妒、贪欲和愤怒。但宗教家认为,被流星砸中的不幸很难用人的性格和意志来解释。《圣经》中充满了麻风病人和其他肢体残缺的不幸者,释迦摩尼的传说中也不例外——这些生来不幸的人们象征着人类被流星砸中的命运,而宗教为"无缘由的不幸"提供了缘由和出路:他们只有投入神的怀抱,痛苦才能得到解脱。

被流星砸中的痛苦带来怀疑,让人觉得人生没有公平可言。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这是革命的原动力,人生领域的痛苦却无可解脱,只能在激愤中消沉,或者到信仰中寻求更高的裁决。痛苦和怀疑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通往愤世嫉俗,要么通往神的怀抱。史铁生早期作品的主角,常常是那个骑车轧上茄子的年轻人,包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命若琴弦》中的盲琴师。这些人物和故事代表了史铁生对被流星砸中的命运的激愤之思。后来,他的人物对命运不再抗拒,他的笔下频频出现基督教教义的影子,他似乎正转向神的怀抱。他自我辩难,似乎努力说服自己相信,有一种更高的秩序和归宿,在那里,人生可以重新得到评判。

我不知道辩难的结局如何。《务虚笔记》之后,史铁生渐渐走出了我的阅读视野。我对他的信仰世界并不确定,也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一种兼具洞察和慈爱的力量,是否真的相信,在某个未来的时空里,错误可以得到纠正,苦难可以得到抚慰,失落终究会有补偿。

既不激愤,又不委身神的怀抱,仅仅是通过思考生的痛苦而在死亡到来时获得平静的解脱,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的有无,若有,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从留下的文字里和遗嘱来看,史铁生已经从肉体的痛苦之中得到了解脱。那无理由的不幸带来的精神纠结呢?他的答案在哪里?我们的答案在哪里?

图为肖全所摄史铁生。

INTERVIEW 访谈

乡村的问题该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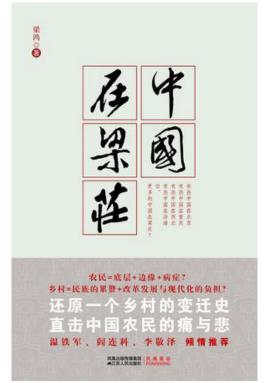
——梁鸿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 (北京, liufang0815@gmail.com)

五奶奶的小孙子掉在河里淹死了。这两年村里挖沙太多,河里到处是漩涡,每年都要死几个人。五奶奶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把孙子交给她看,谁知给看没了,怎么交待? 五奶奶哭天抢地: 老天爷, 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春梅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她结婚不到一个月,丈夫根儿就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后来连春节也不回来了。春梅整天在家里等,精神有点恍惚,婆婆骂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听说隔壁村有人打工回来得了性病,春梅愈发失魂落魄。这天出去施肥,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子化肥都撒在了别人地里。她喝了敌敌畏,临死之前却惊恐地喊:我不想死呀,我想活。

八十二岁的刘老太被杀害并强奸了。调查期间,村里被盘查的老单身汉一个吓傻了,一个吓疯了,最后查出的凶手却是还在高中的王家少年。他从小一个人生活,父母去新疆打工,奶奶去世,哥哥混了几年黑社会。案发那天他自习回来看了会儿黄色录像,就拿着砖摸到刘老太家把她杀了。2009年,王家少年被判死刑。



•••••

在作家梁鸿的描述里,她的故乡如此悲惨和脆弱。在这本以非虚构手法写就的《中国在梁庄》里,各 式悲剧轮番在这个仅有六百多人的村子里上演,让仅仅透过纸面窥得一角的读者喘不过气来。

更沉重的是随之而来的疑问:梁庄真的是千万农村中普通的一个?它真的能代表当代农村社会的模样?

悲惨在农村是正常化的

问: 读了你的书觉得非常恐怖,如果农村真的都是这种状况,太可怕了。

梁鸿:我以前每年都会回农村,对农村的状况大致有一些了解,但是真的走入乡村之后,你发现其中 有太多内在的伤痛和撕裂,真的有点恐怖。现实比我预期要严重得多、复杂得多,想不到得多。

比如王家少年的案子,我听别人讲过很多次了,但你去了解才发现,有那么多复杂的观点和分析在里面,包括我父亲这一代人的感觉,刘老太儿媳的感觉,法官的私人意见……这些复杂声音在乡村汇集,恰恰展示了乡村各种话语的复杂性,传统的、现代的、留守儿童的,它们最终成为这样一个悲惨的事件。

问: 为什么你选的事情大都这么悲惨?

梁鸿:实际上这在乡村来说是非常正常化的。这也恰恰见出乡村的苦难之深。比如菊秀、我哥哥,这样抱着理想最终走进死胡同的人在乡村少吗?我通过文本呈现出来,好像很典型,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青年,有多少这样的生活。真的乡村就是这个样子。

问:我觉得你回乡写自己家人、乡亲的故事,是件很有勇气的事。因为这不单单是聊天、记录,还要把整个村庄的伤痛公之于众。

梁鸿:是,因为它与你息息相关,不是陌生人,它的生命与你的生命之间有非常久远的联系。我一面在采访、在写作,一面也在不断挣扎。我想通过他们的生活来让更多人知道乡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只能通过我的故乡,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部分。但实际上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的家人知道。一开始他们也好奇,你怎么还不走,你怎么又回来了,但是我从没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我手里拿一个录音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也不好意思问。这说明彼此之间还是有戒备的,如果他跟你真的特别熟了,没有一点隔阂,他肯定会拿过来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你在这儿干吗呢?所以这也是我心里面一直……尽管你一直抱着接近他们的愿望,但是实际上始终他们跟你之间还是有某种距离。



问: 有些人一边把心事告诉你,一边嘱咐你千万不要写出来。

梁鸿:我告诉我少年的朋友菊秀,我回来要做一点乡村调查,但是我也没说要写成书。她特别开心,自己的经历能变成文字,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很担忧,比如书里说的她在郑州拉人到砖厂的经历,对她个人来说是非常黑暗的经历,她非常痛苦。我之所以写出来,是因为我认为这不是菊秀的错,她这样不断反省自己,比如坐在火车站她一直想哭,这说明更大意义上她是生活的受害者,生活把她抛到这样一个轨道上,她没有办法摆脱。我想让大家知道在乡村有这样一种生活,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曾经有浪漫的理想,向往高雅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天天被拖到黑暗之中,没有一点可能性重新回来。

她现在生活很辛苦,开一个麻将馆,人手不够老凑手,时间长了自己也会上瘾,每天都要摸两圈。我 走的时候她说明年一定要买个房子,要让孩子有条件好好学习,她在孩子身上加入了她的梦想。但我感觉 这个梦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她儿子那年已经 **12** 岁了,一点也不想学习。

我们童年是伙伴,家里都很贫穷,但都很喜欢上学,喜欢写日记。还有霞子,我们三个人曾经在一张 床上住过,关系那么好。后来我和霞子考上县里的师范,毕业之后她回去教书,我教了三年小学又考了教 师进修,然后自学本科,考了研究生、博士。菊秀又考了三年没有考上。三个女孩子因为生活遭遇的不同, 命运完全不同了。我穿着光鲜,貌似说话很深刻,这恰恰是她一开始想要追求的东西。我当年如果没考上 大学,我肯定就是菊秀了。

乡村的文化生态被破坏掉了

问:书里涉及许多问题,留守儿童、空壳村、乡村教育危机、养老危机······都与青壮年倾巢而出去城市打工息息相关。据你的了解,这几年有了新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之后,打工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吗?

梁鸿:南方我不是很了解,北方耕地资源现在很少,乡镇的吸纳能力也差,要想赚更多的钱,只能去城市。大城市现在迅速膨胀,把所有资源都吸收过来,这也意味着人要随着资源走,但是城市既吸纳农民又排斥他们,这非常可怕。比如我有时会跟门口的保安聊天,他十七八岁,一个月赚一千多块钱,听起来还好。但是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是一千多块钱怎么办呢?他能在城市结婚吗?如果生了孩子,孩子去哪儿呢?他已经在城市生活这么久,你让他回到农村,他也不能适应。这里面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心理问题。

打工就是"讨生活",老人们特别清楚,儿子是不会在城市扎下根的,终究会回来。在现有制度下,比如孩子考学,必须要回家学习,一旦回去就是与父母分离,重新适应农村,而他对农村是没有感情的。而乡村的教育又很糟糕,寄宿条件也差,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我们村已经没小学了,镇上的小学教育的质量和氛围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期望越来越低。

问:可是另一方面家长们还是认同考学出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那为什么对教育的尊重越来越低? 梁鸿:现在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上学的,这是农村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比如我早年上学的时候,我姐姐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长的信,中间有一句话说:上学是你唯一的出路!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第一,父母不在身边,孩子没有完全的童年,爷爷奶奶年老,能让你吃饱就不错,感情上存在爱的缺失;第二,整个村庄是涣散的状态,没有任何青年人,没有正常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他们平时就是上网、看碟、看电视,这样长期下来,孩子对外界的接触和自己的认知都有某种问题;第三,在学校里面,老师是一种绝望的状态,社会不重视他们,工资也特别低,孩子们也不好好学习,老师也管不住或者不想管。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下能好吗?这样的大环境,孩子怎么能自动成为一个好孩子?

其实不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而挤压在教育身上。比如乡村教育,乡村的文化 生态被破坏掉了,才出现了教育下降这样的衍生品。王家少年的案子也是一样,是所有问题的一个突出体 现。

问: 你费了很大力气见到在狱中的王家少年,但是心里难过,什么也没问?

梁鸿: 我觉得问什么都很残忍, 我问他什么呢? 你父母不在身边对你有什么影响? 强奸那会儿你怎么想的? 你对社会什么感觉? 仇恨? 还有什么呢? 他说不出来的,这些问题也都没有意义,都是明知故问。

这一篇是我最展示自我矛盾的一篇,我同情他,觉得他有些无辜。可他又真的是杀人犯,他的笔录我原封不动抄下来,那么冷酷、不带感情。也许我的同情只是因为他杀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再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如果他杀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呢?是孩子呢?那么多问题积聚在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思考。包括乡村有自己的道德评价,觉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问:读完全书,才感觉到现在农村这么沉重,又这么脆弱,好像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没有一个环节不是问题重重。

梁鸿:你说的"脆弱"非常对。现在乡村的道德体系、文化体系以及整个生存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可能它从来都如此,但是现在有现代性的加入,各种社会问题的挤压,这个脆弱具体化了。我们可以随便做一个乡村样本,每个村子都有很多事情,比如我提到隔壁村女人自杀的事情,可能大家不觉得什么,乡村妇女自杀是非常普遍的,但现在是外界的压力大于纯粹自身的问题,问题方向是不一样的。她觉得艾滋病



丢人了,这背后可能是老公出去嫖娼,这是她无法承受的。整个现代性疾病的进入,落在这个乡村小媳妇身上,她觉得无法承受。

希望知识分子能先行一步

问: 照你看来问题都在现代化的发展上吗?

梁鸿:这种变化应该回溯到更远。我们一贯是善于否定自己的民族,我们犯了急功近利的错误。当然 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的思潮太庞大了,另外跟我们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是有关系的。这种不断否定当然跟政 治思维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感、天然的 纯洁感被挤压掉了。但是经济发展让这些变成实际的社会问题,一步步被挤压、落实。

问: 所以在你看来农村的消亡是必然吗?

梁鸿:我们一方面说,现代性的进入是一种必然,乡村中国的消失是一种必然,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么多问题,好像我们都无能为力。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进入的过程做很多更稳健的措施。比如"被上楼",如果都是这样急功近利,肯定都有很多伤害。比如火葬的事情,中国农村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火葬这么多年,中间一段时间特别激进,扒坟烧尸。但是就我们村庄而言,没有一个老人是没有土葬的,即便是不得不火化,也是把骨灰盒放在棺材里面再埋下去。实际这个政策一直没有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绝对呢?我们可以宣传火葬,控制土葬,但不必完全否定这个东西。这背后有我们这个民族情感的独特延续方式,有长辈与幼辈之间传递生命的方式。每当我站在我母亲的坟头,我是感慨万千。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了重负,我的生命是严肃的、崇高的,我爱我母亲,因此我爱乡村,我爱大地。这种感觉难道不是非常好吗?这种感受一定都是落后的、否定的吗?

我们的执政者从来不真正考虑农民有什么具体要求,他们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总是说他们太愚昧了,太落后了,给他们好还不要。这种偏见是 **20** 世纪之初就有的。如果真的走进农民生活看一看,肯定有不一样的认知。现在虽然他也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也要搞政绩,可能他的父亲也是土葬,但是他依然要绝对推行政策,这是最糟糕的。

问: 政策层面的影响力自然是最大的,但似乎不足以指望它慢慢做出改善。

梁鸿: 我希望知识分子能先行一步。因为知识分子能够书写,这能引起民众去关注和思考。思考本身总会影响行动。民众从思考到行动的过程,虽然很漫长,但是能成功,还是有希望的。

问:有这么多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你认为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思考仍是缺失的吗?

梁鸿:当然已经有很多思考,但有些是隔靴搔痒,或者很多是套用西方的理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现代性啊、文明啊、开放啊、民主啊,这些当然都是好的,但是怎么落实到本土上?如果一定要一元化的西方文明,那就下决心搞破坏吧。但是我们不需要多元文化吗?我们的民族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吗?知识分子现在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思维,有哪些是被同构了?我们的情感,有哪些是被我们的眼睛遮蔽了?我们所要做的是,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运动。

以故乡成名是一种羞耻

问:你在书的序言里说,开始这场探访是出于长期的困惑,觉得自己的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毫无关系。"书出版之后,这种困惑解决了吗?

梁鸿:困惑是没可能解决的。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顿,觉得自己的精神跟现实之间有隔离,生活很虚空,写着貌似深刻的文字,实则空虚无比。因为我们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找不到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写完这本书之后一方面我的这种焦虑得到一些舒缓,因为我确实在做一件事情,得到了肯定,同时也激发了思考,另一方面,忧患意识更深了,因为很多问题超乎你的想象,你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你真的感觉很无力,你自己可以吃得好穿的好,包括现在因这本书获得一些名和利,但这些名利跟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以你的故乡和故乡人们的沉默生活而成名是一种羞耻,实际上你是一个大的偷窃者。你很难替他们做一点事情,你更难替他们生活。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只能更多写作,更多做一些事情。如果我的东西有一天能影响大家的看法和行动,也能减轻我的负疚感。但是这种负疚感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原罪感,你的城市越膨胀,你的道路越宽广,你的高

楼大厦越多, 你对农村的剥夺越多。

问:书出来之后你有没有给你采访的乡亲们看?

梁鸿: 我没有想让我的乡亲们知道,不想他们难过。对他们来说,这种苦难已经是正常的状态,或者说他们已经压缩到他们能接受的状态,但是现在像弹簧一样,你的书又把弹簧弹起来。太残忍了。

比如菊秀,讲的时候只是她一个人的故事,不知道她的故事是在那么大的悲伤里面,如果她看到这本书,看到自己居然在这样一个层面生活,她会哭的。这种伤心是难以弥补的,你也无力改变。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河流是清澈的吗?你能给他提供清水吗?但我们整个社会是经济至上,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从来没有让他们知道,那坑塘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用单向衡量一切,只看结果,把过程的复杂性抹掉了。

问:有没有读者因为你的书而采取了一些实际关注农村的行动?

梁鸿:我的朋友看了这本书之后,说也要去湖南老家看看,我听了特别高兴,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达到了。前两天,中央民族大学有学生自己找来请我做讲座,只有二十几个人,我说五个人我也讲,因为它影响了青年人的心灵,他们是自发想思考一些问题。

也有陌生读者给我打来电话。天津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河南的打工者,找了好久才找到我的电话,只是因为看到《新华文摘》上的节选,说一定要听听我的声音。他说我写的村庄很像他的家乡,那些故事他们村里都有,然后他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 30 岁,孩子 6 岁了,哥哥父母都在天津打工,现在问题是孩子要上学,必须得回去,但是出生就在天津,回去就必须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他们之间又没什么感情。我



听了也很难过,最难过的是他反过来说,我也知道国家有难处。我真的很无力,只能快递一本书给他。一个打工者费那么大力气给你打电话,他也知道你没有办法。

有人问我这本书能起什么作用,我觉得无非是让大家真切地感知到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 至于怎么解决,我真的没什么办法,我只是提出,希望能让民众、政策决策者看到,引起大家的思考,就 足够了。



问:在这本书里你提出许多大的社会课题,你自己下一步是否还会沿着这个方向走?梁鸿:有关梁庄,过十年之后我可能会再写,比如对同一个人物追踪,有长线的计划。

下一步我打算做的,是探讨知识分子与乡村建设的课题。从上世纪初开始,有很多人在努力,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他们的实践非常勇敢,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纸上谈兵。但是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还是不够的,没有形成有效的场域。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回望我们的家乡。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是否真的只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即使说必须城市化,怎么去城市化?需要非常具体化的工作,而不是纯理念的叙说。

我想要梳理,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乡村建设,它的成功、失败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它是否有效,它面临的压力、阻力、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乡村本身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知识分子的乡村理念与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努力即使失败也是成功的,因为其中可以总结许多教训。只要不断去做,总会有一天会摸索出来这条路。但是如果社会从不关心,如果知识分子失去了勇气、信心,那整个国家都会是漠然状态。

图 2、3、4、5 均为梁庄

鸣谢:季风书讯

搜狐新闻

搜狐读书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u>shrbooks@gmail.com</u>,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